

墨香佛音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

毛秋瑾 著



快樂不可言其中心有朕飭玄煌奇珍不可
計其國中有菩薩名曇无竭在眾菩薩中
高尊有六百八十萬夫人采女共相娛樂
捷地國中諸菩薩常共恭敬曇无竭為於
國中央施高聖隨水轉下施聖中有黃金
聖白銀聖琉璃聖水精聖上皆布雜色
聖香華聖上皆施雜寶交路之蓋中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毛秋瑾 著

墨香佛音

送堂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课题获教育部 2009 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09YJC760037) 资助
本书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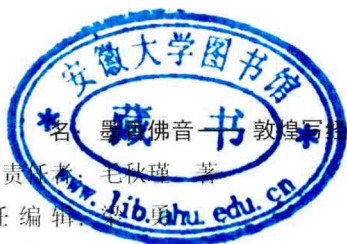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香佛音: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 / 毛秋瑾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培文·艺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24418-0

I. ①墨… II. ①毛… III. ①敦煌学—书法—研究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7494 号



书 名: 墨香佛音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

著作责任者: 毛秋瑾 著

责任编辑: 刘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418-0/J·05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联城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79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言一

华人德

古代的佛教写经，除了寺院中的僧尼和笃信佛教的清信士女，以及佣书为业的经生作为临习和抄写的范本外，几乎不进入凡俗人临池的视野。因此无论出家或在俗的人都不会把经卷作为书法作品来观赏。它的传播和受人供养、诵读完全是出于宗教信仰。当然写经的字迹有优劣之分，而抄写者不论水平的高下，都会在极其虔诚的心态下去认真完成。

至迟在汉代，书法已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人们崇尚名家书法的心态也随之产生。这种心态延续到清代中后期碑学书派兴起，才逐渐改变，审美角度、取法对象、书写用具及技法等等都与以前有所不同。非名家书迹只要合乎审美要求，就会被奉作经典。

敦煌石室秘藏被发现不久，法国学者伯希和携所得文书途经北京，为罗振玉等人所目睹，并知石室中尚留有数千卷文书，于是力促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查封石室，并由学部将所余遗书于宣统二年（1910）秋悉数运至北京，沿途和京师的一些达官名士，巧取豪夺，精善者，往往入于私家，剩余者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约八千余卷，十之九为佛教写经，其中有许多是古人也不得而见的唐以前写经，使得能见到这些写经的上流社会的人大开眼界。罗振玉不但对抢救劫余的敦煌遗书有功，而且对敦煌文献的整理考校、编辑影印不遗余力。他曾要求伯希和将运回巴黎的敦煌文献拍照寄赠，并向一些日本友人借录影摹所得的写卷，连同自己收藏的写卷，自1909年起，不断陆续编辑影印，以广流传。罗振玉影印的一些敦煌文献图录，虽然不是以书法为目的，

但其中有一些是六朝隋唐的写卷，书法十分精美。而留在中国的敦煌写卷，十之九是佛教写经，其中“尤精善者，多入私家”（梁启超语），社会上知识分子较容易见到真迹。唐人写经，多受欧、虞、徐、颜、柳等名家书体影响，有一些也与传世的《灵飞经》刻帖风格相近。而六朝写经，与流传的《黄庭经》《乐毅论》等刻帖无论用笔还是结体都迥然不同，且六朝小楷真迹，几乎没有存世，突然能见到真容，这种带隶书笔意、体态开张飘洒，气息古穆醇厚，具有共同特色的书体，给人一种新奇感，为一些学者和书法爱好者所喜爱，并将这种书体称为“六朝写经体”。

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中华书局用珂罗版影印了一部《六朝隋唐写经真迹》，共六册。所收有《六朝大方广佛华严经》《六朝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隋第三分阿摩昼经第一》《隋增一阿含等趣四谛品第廿六》《唐妙法莲华经四品》《唐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六种，皆精美腴润，前三种尤为出色，为写经中之上品。原迹为邵阳李氏宝墨斋藏，由高野侯鉴定后出版。这可能是敦煌写经完全以书法为选印标准的最早出版物。

1959年饶宗颐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中选出一些书法之佳者影印，名为《敦煌书谱》。而后又选录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编辑为《敦煌书法丛刊》，1983年由日本二玄社影印出版，共29册。其中拓本一册，韵书一册，经史十册，书仪一册，牒状二册，诗词一册，变文一册，碎金二册，写经七册，道书三册。选录标准为：一、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二、注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每件撰有提要，时人研究成果间亦酌采。编选十分严谨，并将图册正式以“敦煌书法”命名。

自1949年至1980年代，大陆的书法爱好者基本上见不到国内外收藏单位所藏的敦煌写本真迹，也看不到民国时期和海外的相关出版物，对敦煌书法的研究本来在敦煌学中就较为晚起，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由于见不到完整的资料，研究也几乎无从谈起。例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的一次学术争论——“兰亭论辩”。认为《兰亭序》是伪迹的一派，再三将与王羲之年代相近的东晋墓志的刻字和六朝佛教写经，包括以写经体抄写的《三国

志》残卷等作为例证，来推定“王羲之书法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东晋墓志的功用和刻字的形体，自有它形成的原因，在此不予讨论。而佛教写经体至少在唐代以前基本上也是自成体系，并且滞后于日常通用的楷书书体的演变。由此可见，参与论辩的诸多著名学者并不了解“六朝写经体”形成的原因。将保守而成定式的写经体与杰出书家王羲之“变古形”的“新体”来进行类比，是不恰当的。

到1990年代，国内一些出版社开始与海内外敦煌文献的收藏单位合作，出版大型图集。这些大部头的昂贵图册，一般都只是由大型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收藏。它们以反映文献内容为主，字迹往往很小，并不适宜临习和观赏。但是这些图书的陆续出版，引起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对敦煌书法的关注，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与大型图集出版同步，一些适合于书斋案头观赏和临习的小册子也不断涌现，有各种碑帖、简牍、墓志、造像、金文、甲骨、帛书、写经、残纸、砖瓦，异彩纷呈。有关敦煌书法介绍和研究的论文、著作，也陆续有所发表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王学仲先生曾有文论述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除了传统所认为的南北书派和北碑南帖以外，另有独立的经派书法——写经和刻经（摩崖与经碑）存在，应该是三派鼎立。当时也有书家撰文认为这样的分类，逻辑上不能成立。事实上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写经书法（包括北朝后期的刻经，其实刻经是放大的写经体式），其宗教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相对地域和时代的特征则较弱，书体演变保守滞后，自成体系。王学仲先生的观点是独具只眼的。

因为其时供观赏和临习的出版物众多，书法展览和比赛频繁，书法创作也显得十分繁荣。许多古代的书迹妍媸杂陈，有些书家为了另辟蹊径，将一般人视为奇诡怪异、稚拙丑陋的字作为取法对象，当然也包括敦煌写本，并将这一类书迹统称为“民间书法”。一时追随者众，风行草偃，举世皆学奇怪。

提出“民间书法”的概念，理论上是欠周密的。他们笼统将那些粗糙稚拙、丑陋怪异的书法和经工匠制作的某些类型的书迹均指为是“民间书法”。按理，“民间”的对立面是指“官方”和“上流社会”。但是某一类型的书迹看似为下

层工匠所制作，但其设计、书写者应是皇家和政府机构的属吏——尚书、令史、掾、书佐等所为，如汉代宫苑、陵寝、官署、仓廩等建筑的文字砖和瓦当，简牍中的公文、律令、簿录等，包括烽燧关口遗址发现的为了应对“能书会计”考核之习字觚，都非民间人士所书。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大多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许多上流社会的人不一定擅长汉字书写。北齐皇帝元旦朝会时，“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即佩刀）及席。”还有两位北齐的开国佐命元勋，一位是鲜卑老公库狄干，一位是敕勒老公斛律金，都是出将入相的大臣，但是都不会写字，连自己的署名都写不好。这些都有见于正史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假如这些上层人士的书迹流传至今，是否就可归入民间书法？还有些提出“民间书法”概念者，把敦煌写经也统归于“民间书法”中，并选出一些字迹生拙丑陋的写经，用创作的理念去说解，并大加推重。抄经的过程应是虔敬信诚的。梁代僧佑所撰《出三藏集记》卷七《般舟三昧经记》中讲：《般舟经》于汉建安十三年（208）译成校定，“后有写者皆得南无佛”。“南无”为梵语译音，即合掌稽首。所以抄经者必须恭敬虔诚地抄写，并不会臆入书法创作的意图。

毛秋瑾女士的新著《墨香佛音——敦煌写经书法研究》在全面整理了敦煌文献中有纪年的佛经写本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讨论的是官方与佛教写经，其次是佛教、道教与写经书法，然后是写经人——僧尼、信众、写经生与写经，最后是讨论写经体的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西晋及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写经书法风格及其历史地位。后两个阶段讨论的内容，当今书坛研究敦煌书法的学者关心得比较多。而对写经在唐以前的两个发展阶段，往往曲解为是书体从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过渡阶段，书体尚未演变为成熟的楷书。其实是忽略了写经体发展的滞后性。而对僧尼、信众、经生的写经，则很少去看这些人的社会背景，就事论事较为普遍。对于写经体发展的滞后性，虽不是毛秋瑾首先发现，但是她在书中曾关注并讨论过。尤其是运用敦煌写本来研究与书法相关的宗教、社会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参考了敦

煌学其他领域研究者的成果，使其对写经书法的研究十分深入，而超出同类研究者，这与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敦煌学和书法的研究锲而不舍是分不开的。这部著作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部分章节已经发表过，是目前对敦煌写经书法论述较全面的一本书。以前的中国书法史论著对古代写经部分的论述一般较简略粗疏，甚至是忽视的。这本书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可以补苴罅漏。对已有研究得出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也进行了商榷。可以帮助临习或创作上对敦煌写经书法要有所取法者，能了解其发展脉络和相关背景，不至于误读或偏执。这些都是著者殷切的期望。

2014年5月4日于灯下

序言二

莫家良

一直以来，中国书法史的研究都是以文人传统为中心，重视探讨文人世界中书法艺术的形式、风格、内涵，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等课题。然而，在文人书法以外，实不乏有其他的书法领域，值得关注。敦煌写经书法，便是其中不可忽略者。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大量的经卷写本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素材，部分学者遂将这些材料作出整理、分析、研究、出版，所涉范围包括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等，形成了所谓“敦煌学”的学术新领域，其中在艺术方面，即有写经书法的研究。目前所见有关写经书法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补充了书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2006年，秋瑾女棣于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敦煌写经书法研究》便是一篇全面探讨敦煌写经书法的佳作。该论文不仅讨论写经体的形式及书风等艺术问题，更探究相关的历史及文化背景，包括官方、朝廷等推动力量，佛教、道教等宗教影响，僧尼、信众、经生的角色等，以便能更准确解读写经书法形成与发展的种种因素。事实上，书法艺术并不单纯是书风的问题，文人书法如是，敦煌写经书法更是如此，若不从历史及文化方面去了解，实难以重现写经书法的真实面貌。秋瑾女棣此博士论文于资料的考索与整理上，曾下极深的工夫，而其讨论、阐述、辨析，皆条分缕析，言必有据，实事求是，展现出平实而严谨的学风，对写经书法的研究殊有裨益。

时间匆匆，现距博士论文的完成不觉已七年。这七年以来，秋瑾女棣于苏州大学教学之余，仍汲汲于学术研究，对敦煌写经书法的关注，从不间断。

此书《墨香佛音——敦煌写经书法研究》，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定而成，在资料上固然有所补充，而内容亦更为丰富翔实，立论、观点等方面，也更有深度。可以说，此书的出版，为敦煌写经书法提供了最为全面的参考，相信可得到中国书法史与文化史学者的肯定。

谨此为序。

2013年12月于诚明馆

目 录

序言一	华人德	3
序言二	莫家良	9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回顾		2
(一) 出版图录		2
(二) 真伪辨别		9
(三) 研究概况		20
第二节 研究范围、目的及方法		29
第二章 官方与佛教写经		31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官方写经		32
(一) 北凉沮渠氏与写经		32
(二) 北魏官方与写经		37
(三) 西魏、北周及南朝统治者与写经		50
第二节 隋唐宫廷写经		56
(一) 隋宫廷与写经		56
(二) 唐宫廷与写经		58
第三节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官方写经		67
(一) 吐蕃官方写经		67
(二) 归义军统治者与写经		70
第四节 小 结		77
第三章 宗教与写经书法		79
第一节 佛教写经与书法		80
(一) 佛经的翻译与抄写		80
(二) 佛教写经所用书体		87

第二节 道教写经与书法	105
(一) 有题记的道教写经	105
(二) 道教写经与文字书法之关系	118
第三节 小 结	124
第四章 写经人和写经书法	125
第一节 僧尼与写经	126
(一) 佛教初传时期的僧侣与写经	126
(二) 南北朝时期的僧尼与写经	130
(三) 隋唐时期的僧尼与写经	138
第二节 信众与写经	144
(一) 南北朝时期信众与写经	145
(二) 隋朝信众的几组写经	151
(三) 唐、五代、宋初信众与写经	158
第三节 写经生与写经	166
(一) 写经生与佛经、道经的抄写	166
(二) 学仕郎的习字抄本	173
第四节 小 结	176
第五章 写经书法艺术及其历史地位	177
第一节 “写经体”的形成和发展	178
(一) “写经体”的形成	178
(二) “写经体”的发展	187
(三) 写经书风的若干问题	197
第二节 敦煌写经的价值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217
(一) 写经书法的历史际遇	217
(二) 敦煌写本书法的价值	223
第三节 小 结	230
结 语	231
参考文献	233
附 表	246
后 记	289

第一章

绪 论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藏经洞出土的几万卷文书写本为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也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敦煌学”，涉及社会、历史、文学、宗教、艺术、中西交通等各个领域。对于书法史的研究而言，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写本也是不容忽视的素材，一是因其数量之大；二是写本年代从晋至北宋绵延七百余年，时间跨度长，且部分写本题记中有确切纪年；三是流传至今的魏晋墨迹数量相当少，早期敦煌写本为了解和研究当时的书法面貌提供了依据，犹显珍贵。

百余年来敦煌书法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从图录的影印出版到研究论文的发表，从探究字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到写卷书法的审美，书法史学者对敦煌写本及西域出土的其他文字材料的研究正向更为深广的领域扩展。对这些方面已有的研究，笔者将在本章中做一总结，分析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不足之处，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

第一节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回顾

一百余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和其他文物流散至多个国家，成为公立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的藏品。目前收藏敦煌写本数量最多者，有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外，敦煌写本还散藏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在数量巨大的敦煌写本中^①，佛经写本占写本总量的90%以上，因而写经书法是敦煌写卷书法的主体部分。除经卷写本以外，其他写本包括经典古籍、世俗文书、蒙童读物等内容。笔者观照的对象不限于经卷写本，而是包括各种内容的写本在内。下文中将敦煌写本图录的出版、真伪辨别以及写本书法研究现状等方面逐一介绍并稍作分析。

（一）出版图录

在印刷术发明前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学习、研究书法皆以墨迹或拓本之类的物件为对象。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印刷术出现了飞跃。在没有条件见到实物的情况下，依据图录等印刷品，学者们也能从事书法研究。毫无疑问，印刷品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印刷品对于研究写本书法来说，还存在一定缺陷，譬如研究者只能通过印刷品看到字体的基本形态，虽然纸张、

^① 据方广锠《敦煌遗书编目所用数据库及数据资料》一文：“汉文遗书大约有58000号，分布如下：1. 英国图书馆，约14000号；2. 法国图书馆，约4000号；3. 中国国家图书馆，约16000号；4.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19000号；5. 日本散藏，约2000号；6. 中国散藏，约3000号；7. 西欧、北美及其他地方散藏，约数百号。”《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95。

墨色、尺寸等情况也可以在著录中得以反映，但这和观察实物还是有较大区别。

尽管印刷品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由于这些敦煌写本散藏在多个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之手，若不通过印刷品刊表，研究者穷一生之精力也难见到五万余件写本，很难了解到敦煌写本的全部面貌，不可能对敦煌写本书法进行全面的研究。而敦煌写本的发现正当印刷术进入到近代机械操作的时期，^①因此敦煌写本引起学者重视后，借助当代印刷技术而广为流布，为学者的研究和书法爱好者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到北京，向京城的学者、官僚展示了他在敦煌所获古代写本，中国学者继叶昌炽之后认识到这些写本的重要价值，收藏之风悄然兴起，甚至有官员借押解写本入京之机及运抵学部后监守自盗。^②伯希和在京期间，罗振玉(1866—1940)等学者曾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③此后罗氏又陆续影印出版了《鸣沙石室佚书》(1913)、《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敦煌零拾》(1924)、《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4)、《敦煌石室碎金》(1925)等书。其中最有价值的当为罗氏1939年影印出版的《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一书，此书按敦煌写本原大刊行，几乎汇集了罗氏收藏的全部敦煌写本，刊印颇为精美，写卷多处钐有“罗振玉印”和“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等印章(图1-1)。^④



图1-1 “罗振玉印”“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第1册)

①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页13。

② 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页1—18。

③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页166。

④ 关于罗振玉所藏敦煌写本的去向，笔者留意到一些相关信息。2004年8月7日的《南京日报》A11版和8月10日的《南京日报》D8版均报导南京博物院新发现31件敦煌文献，留有序、跋、加盖印章最多的就是罗振玉。11月2日笔者为此专门走访了南博保管部主任凌波，据她介绍，这批文献入藏南博已有几十年历史。遗憾的是笔者未能见到实物。根据报纸上所登照片，卷子上确有“臣振玉”“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两方印章。

罗振玉之后，饶宗颐先生于 50 年代末发表《敦煌写卷之书法》^①一文，文后附有《敦煌书谱》，选取了英藏敦煌文献中二十余件写本予以刊布。其后他又编撰了二十九卷本《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于 1983—1986 年出版。由于此套书在日本出版，国内较少见到，使用不方便。后经过荣新江先生重新编排、刊正疏失，于 1993 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名为《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共八册。刘涛先生曾为本书撰写书评，认为此刊本兼顾到书艺和书法史料两大方面，编撰体例基于写卷内容分别门类，而且设有“解说”一项，概述选刊卷子、品评书法，都是这部图籍的重要特色。^②

中国大陆自 80 年代以后，单从书法角度编辑的敦煌写本图籍时有问世，如徐祖蕃、秦明智、荣恩奇合编的《敦煌遗书书法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 1985 年出版，此书收入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所藏写经精品三十七件，但正如刘涛先生所说，“美中不足的是书法品类局限于写经体态，于卷子本身的情况缺少必要的解说性介绍”，“专注书法的欣赏，放大的图版占据全书的大量篇幅，编者似乎还存有让该书兼充书法范本的意图”。^③另外还有沃兴华选编、上海书店 1995 年出版的《敦煌书法》，意在为书法家提供创作资源。此后又有刘墨主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敦煌写本书法精选系列》，全书二十册，编排体例是以内容来区分，每册前言有主编对本册内容的简单介绍，一册中收入一种或数种敦煌写本，意在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临摹学习的范本。这类图录既非公布藏品供人研究的出版物，又非个案研究的图籍，大多为有选择的翻印，而且写卷数量少，不具学术价值。

由敦煌研究院编辑、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书法库》是较为重要的图籍，全书共分四辑，出版时间在 1994—1996 年。全书按时代进行编排，第一、二辑为魏晋南北朝写卷，第三辑为隋唐写卷，第四辑为唐代写卷。每辑卷首

① 饶宗颐：《敦煌写卷之书法》，《东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第五卷（1959—1960），1965，页 41—45。

② 刘涛：《〈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1995），1996，页 376—381。

③ 同上，页 377。